

南斯拉夫問題資料

第三輯

G-6
000087
V₃

內部資料 負責保存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編印

1956年7月24日

南斯拉夫問題資料（第三輯）

目 錄

- ✓ 1、卡德尔：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1）
- 2、卡德尔：關於区和公社的新機構……（47）
- 3、關於公社和区的新機構的一般法……（80）
- 4、卡德尔：四年經驗……（105）
- 5、卡德尔：南斯拉夫的政治和經濟狀況……（114）
- 6、卡德尔：对有关南斯拉夫國內政治發展問題
的回答……（122）
- 7、有关工人委员会的生活和工作的一些实例……（133）
- 8、米·托多羅維奇：兩条战綫的斗争……（150）
- 9、卡德尔：共產主义者在社会和國家制度建設
中的作用……（178）
- 10、列里可·弗拉赫維奇：論社会主义各种力量
合作的形式……（183）
- 11、鉄托：南斯拉夫的經濟問題……（196）
- 12、鉄托談話的國內部分（1955年8月）……（224）
- 13、鉄托關於党、關於南斯拉夫的國內政治發展
和機構、關於对苏联及社会党的态度的言論
（摘自1948年7月—1955年2月时期的演
說、座談和談話）……（228）
- 14、“我們的社会”雜誌第一期卡德尔論文摘譯……（244）

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實踐

(爱·卡德尔在1954年10月訪問挪威期間，在奧斯陸工
党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

在西欧，關於南斯拉夫和它的政策很普遍地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第一，在1948年以前，南斯拉夫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是採取斯大林的蘇維埃制度的立場；第二，只是由於蘇聯壓力的結果，南斯拉夫才在1948年和以後的年代中被拋上了反對官僚主義和保衛民主的鬥爭道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建立反抗這種壓力的思想和政治基礎；第三，既然南斯拉夫已經走上這條道路，它就必然要或快或慢地沿着正統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方向進展。

可是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和不真實的。所有這三個推測基本上都不符合於現實。

這種情形首先把事件的先後本末倒置起來，因為，實際上，衝突並不是原因，而是南蘇國內制度發展上的不同傾向的結果。正是制度發展上的不同傾向和與此相關聯的在對外政策傾向方面的差別，影響了兩國的關係，而不是相反。顯然，後來兩國間造成的關係起了相反的影響，就是說加強了新南斯拉夫所特有的國內政治傾向。所以這個問題的國內方面和對外政策方面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誰要是企圖把南斯拉夫特殊的內部發展說成只是對外政策衝突的結果，誰就會遠離真理，因而也就永遠不能了解1948年以後南斯拉夫國內政治發展的實質。

一、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

現代社会主义實踐的基本問題

革命的勝利，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力量的面前提出了現代社会主义實踐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是：如何管理那些經過政治行動即經過革命或進化而被收為國有並且已經成了公有財產的生產資料；在生產資料社會化的條件下，人們在發展生產力方面自覺活動的動力是什麼；為了保證最有利的條件以開展人們的自覺活動，在從資本主義到社会主义過渡時期的政治制度應該是什麼？

在理論上和原則上，所有這些問題都早已獲得解決。卡爾·馬克思早已經對它們做了原則的和明確的解答。但是，這些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很明確的原則與遠景的實際實現要採取什麼樣的具體政治形式問題，却是遠不夠清楚的。在這方面，馬克思本人沒有得出而且也不能得出肯定的結論。很明顯，他根本不願意幹那後代人們應該去幹的事情。起初，他大概是認為國家機器是無產階級應該藉以實現它的社会主义歷史作用的主要工具，這當然就要以新的國家機器來代替舊的國家機器。後來，馬克思在“拿破侖第三政變記”這本著作里以及在巴黎公社以後，預感到官僚主義的威脅，他非常謹慎地對待每一個獨立的集中的國家機器的作用問題，認為這種國家機器應該由“組織成為國家的無產階級”來代替。他宣稱巴黎公社即自治公社的全國聯合是“那個最終找到的能實現勞動解放的政治形式。”

官僚主义的源泉

俄國革命，在落后的自發勢力的压力下，不管列寧怎样努力想把它的发展導向一个相反的方向，而在斯大林时代却肯定了集中的國家机器是走向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組織形式这一原則。斯大林簡單地把这种國家机器同工人階級的意志和覺悟混为一談，把馬克思和列寧關於官僚主义危險的警告僅僅归結为官僚式工作者的某些特点（文牘主义、拖延、漠不关心、管理机关的非人道态度）的威脅。这样，斯大林就抹煞了作为社会經濟現象的官僚主义。

然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却摒棄了这样一种看法，就是：随着集中管理國家全部生產資料的國家机器的建立，社会生活中經濟力量的每一个独立的自發行动就会基本上化为烏有。

在斯大林看来，國家是全能意識的化身，它能够極詳細地确定經濟力量的动向。國家計劃以及对經濟实行集中行政管理的制度，被宣称为人类意識在調整社会关系方面的唯一表現，而这一領域中的其他一切表現均应盲目服从这种計劃和管理制度。这个機構的要素是：上級机关可以完全支配下級机关，而后者又可以完全支配个人；上級監督下級；檢查执行情况和处分沒有完成任务的人。由此可見，这个金字塔是头朝下倒立的，它不是从社会主义基本原則出發，就是說，不是从解放劳动力、解放那些用公有生產資料从事工作的人們的創造性意志的原則出發，也就是說，不是从个人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出發，然后由最高的社会机关來調整、監督和指導人們的这种基本活动和关系。相反地，它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劳动集体都变成为神秘的技術計劃的盲目

執行者，而且這些計劃的實質常常是廣大群眾所不知道的。

當然，這樣的制度要完全依靠國家機關的工作好壞。為了這個目的，斯大林便實行了一個從經濟上鼓勵這種機關的特別制度。機關如果能獲得優異的成就，就能得到更好的報酬。因此，這種經濟上的鼓勵不能對勞動者的創造積極性起最大的鼓勵作用，而是首先對那控制勞動者的制度起鼓勵作用。於是國家機關就開始在社會關係中具有一種完全特殊的經濟地位。

個人的物質和精神利益或是行政控制

但是，指令和控制，除了當它們是從事自由創造的勞動人民共同利益的表現的情況外，其本身並不是創造力量。在生產資料公有化的條件下，當然只有每個人自覺的勞動意志才能成為這種力量，而每個人自覺的勞動意志是從他本人的經濟和精神利益中產生的。當每一個勞動者越是認識到他個人的利益是和社会集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認識到經過適當的自治機構他可以以平等地位參加解決有關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問題時，這種意志就會越發明顯地表現出來。正是在這些條件下，在生產資料公有化的條件下，人類早已熟知的經驗才能得到充分的表現。這個經驗就是：個人勞動創造的質量，不管是精神的或是體力的，不可能只用外來的干涉（控制和檢查）去取得，而首先和主要的是由創造者本身的質量、由他的創造性意志的質量和力量去取得。社會主義社會首先應該解放這種個人意志，其次應使其經常受到社會教育和專門教育，再其次，應使這種意志建立在個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上，建立在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上，並鼓勵這種意志。因此，高級社會機關的指導和控制職能，只有當它和這個基本趨向一致

时，或者說只有当它首先保証这个趋向能得到充分表現的条件时，才能是積極的和創造性的。

以生產資料公有化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國家制度，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時間內起進步作用並獲得群众的支持，就是說，只有当这种國家制度的作用是指向消滅旧的剝削关系並为新的社会主义关系的發展創造基本的物質和政治条件时，才能起進步作用和獲得群众的支持。但是，只要这种國家制度一变成自我目的，就是說，只要它的停滯过程一开始，就必然会逐漸引起行政机器（它是会官僚主义化的，因为它独佔着經濟管理，因为从这种独佔当中会产生一种趋向，而这种趋向的实质就是：每一个劳动者僅僅是这个國家独佔的毫無希望和毫無能力的工具）和每一个个人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反抗（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他們再不願意去創造比督促他們要做的更多的东西了）之間的經濟和政治矛盾。

这样的制度既能引起經濟的后果，也能引起政治的后果。在經濟上，这种后果表现为劳动生產率的增長会或多或少地延緩，並且缺乏自下而來的对生產力發展的自發压力。可見，就是这种制度，和任何壟断制度一样，也会產生停滯和生產力腐朽的趋向。这种情况当然要求有一个相应的進行控制和施加压力的政治制度，即要求有一个以政治專横和普遍不信任气氛为基础的制度。

在不發达國家中社会主义發展条件的不同

西欧社会主义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它的方向是通过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現有机構去逐漸地和演變地加强工人階級即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屬於这一类的某些具体政策，在何种程

度內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真正现实的一步，当然是值得个别讨论的。但是整个說來，沒有一点疑問，通过正統的欧洲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政治机构來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演变过程，對於一系列的國家說來，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已經成为现实的事实了。

然而这里不应忽視兩点。

目前，这种过程主要是在高度發达的國家中才是可能的，因为这些國家早期便出現在資本主义的歷史舞台上，獲得了特殊的經濟特权，有了經濟力量以及与此相应的很高的生活水平，而这就會減弱它們内部的社会矛盾。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主傳統真正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矛盾的調節者，以逐漸加强社会主义的因素。至於落后的國家，由於沒有任何悠久的民主傳統，而内部又存在着尖銳的矛盾，这种过程的开展要困难得多，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現代國際資本的巨大集中以及發达國家和不發达國家之間的鴻溝日益加深的情況下，任何一个落后國家都不能指望沿着正統的資本主义發展道路求得發展。这样，不發达國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不僅面臨着解放劳动的方法問題，而且首先面臨着使本國从落后状态、从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依賴地位解放出來（这是不發达國家达到社会主义的准备条件）的道路和方法問題。

除此以外，不管一个國家的發展水平如何，任何内部矛盾的極端尖銳化（这种尖銳化是在某种不能在工人运动中实行妥协的制度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毫無出路的特殊条件下發生的），都會使这些矛盾的和平的、民主的解决受到破坏。这种尖銳化必然会導向革命的冲突。旧南斯拉夫的情况也正是这样的。如果認為在这种条件下，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發展的出發

點，就是說，應該把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方式作為向社會主義發展唯一可能的方式，這就等於製造一種教條，這種教條的危害性，比方說，不比另一個教條——把十月革命的道路強加於一切國家——的危害性小些。目前，有一些國家已經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這就在一定條件下足夠清楚地證明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然性。今天來否認這個事實，正像當社會主義通過正統的民主形式而逐漸演變已成為一系列國家的歷史事實的時候來爭論這種演變是否可能一樣，也是錯誤的和可笑的。依我看來，這兩種教條今天都是實現當代國際社會主義的絕對要求的一個巨大障礙，而這種要求就是：找到一條有機的內部團結的道路；不是——比方說——像共產黨情報局那樣要求一致思想和一致行動的團結，而是要建設性的民主合作，以便在通往社會主義的總的運動路線的基礎上把各別的國際社會主義潮流聯繫起來。這樣的團結和認真的、批判的交流經驗，會大大有助於社會主義運動，使它經常成為一個活潑的因素，使它始終能把自己的行動同具體的條件相適應，並把一切能加速人類社會主義進步的趨向和因素動員起來。

對當前自覺的社會主義思想說來，上而所說的乃是行動的主要領域。國際社會主義已經不再處於思想準備階段。在思想方面，它已經基本上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目前在許多國家中，國際社會主義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它首先成了千百萬人廣泛實踐的事業，而這些人們自己常常不知道他們正在進入新的社會關係，就是說正在建立這種關係。非常重要的是：使自覺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具體國際合作從一切束縛和妨礙它們的教條中解放出來，使它們真正能夠最有成效地依賴每一個國家的

具体条件，以便参加到各种不同的自發的物質过程中來，並根据这个或那个國家的特殊条件把这些过程引上社会主义过程的軌道。

我們生活在一个典型的过渡时期中，全世界的政治結構也是和这个过渡时期相適應的。因此，去發明能够適應一切國家的經濟或政治模型，那是錯誤的。無論我們對國家資本主义形式即對官僚行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抱着何等批判的态度，我們总應該了解，比如說，對許多落后國家在其發展的一定階段說來，这种制度也是前進一步，否則就是踏足不前，使自己窒息在內部矛盾中，就是容忍整个民族繼續深陷在落后和依賴的狀態中。不言而喻，如果人类能找到一种經濟援助的方式來加速不發達國家的發展，那末所有这些过程的進展都將會远非那样痛苦。但是，看起來，这种思想的有效實現还是相当遙远的未來的事情。

如果我們估計到这一切，很明顯地，任何把某种特定的运动形式作为唯一可能的形式來強加於別國人民和人类身上的傾向，都必然会產生反动的后果。因此，在我看來，努力在不同制度的國家間建立容忍的共处和合作，目前是一个極端重要的因素，這不僅對於保證和平是如此，而且對於保證人类繼續進步以最有利的条件（讓最進步的社会主义傾向能得到最自由的表現）也是如此。

但是問題不僅在於当今的世界分成了落后的和發達的國家。虽然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能成為或長或短地演變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政治手段，但是在一定階段上，已經獲得的社会主义成就必然要开始改變这个旧的民主機構，因為否則后者就會成為繼續進步的障礙。

經濟和政治民主

我这里所指的是兩個因素，它們迟早都会成为任何帶有社会主义內容的民主制度中的佔統治地位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由於用演变或革命的办法实行生產資料公有化而引起的生產关系的变化，必然要求在經濟領域中也採取民主的管理形式。而且不僅僅要求这样的改变，因为既然生產和經濟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內容，那末很明顯，正是經濟領域中这种新的民主形式提供了建筑在社会主义經濟基礎上的新的民主政治機構的發展方向和形式。經濟民主的思想是一个很老的思想，但是它过去常常被看成为和正統的政治民主併列的东西，就是說，看成为正統的政治民主的附屬物。我認为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不應該忘記，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也是經濟民主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資產階級民主的真正根源正是在於資本主义私有制的經濟关系中，它准确地适应这种資本主义私有制的結構，即适应在其基礎上發展着的社会的經濟要求。因此，經濟民主的現代要求就是要求新的民主政治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以生產資料公有化为出發点的社会將能自由地發展。

今天，根据社会主义斗争的許多經驗，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肯定地說，正是这个“經濟民主”能成为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礎，就是說，它將成为一切新东西的發展方向和形式，將成为民主政治機構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礎。（譯者註：這句話和我駐罗使館根据羅馬尼亞文譯出的不同，从罗文譯出的句子是：“……正是这个‘經濟民主’能变为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礎，即是說，会变为在一社会主义經濟基礎上的民主政治機構的方向和一切新的發展形

象”；也和另一种譯文不同，它的句子是：“……它為建基在社会主义經濟上的整个新型民主政治機構提供了發展的道路和形式。”）这个过程同时是擺脫困难的唯一可能的民主出路，而那些停滯在古老的形式中並成為不能適應新的社会实际的民主制度却特別感到这种困难。

第二个因素是：通过生產資料的公有化和建立管理生產與經濟的相应的民主機構而獲得的劳动解放（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創造意志和精力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應該大大提高个人在社会管理機構中的作用。無疑地，这种發展將日益破坏國家機器的作用和力量，既能加强各种最下層的即与人們、群众最接近的社会自治机关的作用；也能加强一系列与这些自治机关和組織垂直相联的自治系統。

沒有疑問，这也会反映在目前的政党制度和作为政党代表机关的議會制度上。甚至最民主的政党也要限制个人的主动性。首先，它在政治战綫上帶來某种停滯現象，而这就会破坏人們在有关个人和社会利益問題上的直接而生動的創造活动，或者使这种活动非常困难。虽然大家知道，到目前为止，在充滿社会內部矛盾的社会制度下，这样的政党制度正是由於它的这种作用才在政治上是有必要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說，这种政党制度磨鈍了或指導了对立物的矛头，把社会从盲目的自發勢力的压力下解放出來，並且給社会关系帶來了很大的政治穩定性。但是，如果假定存在着佔統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經濟关系（不用說無階級社会，也不用过远地瞻望未來），那末我們就應該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公开的社会矛盾將要減少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政治制度即政党的这种作用不僅會成為不必要的，而且將阻碍現有的社会力

量的充分使用，首先是阻碍每一个人的創造意志的充分發揮。

由於这些原因，應該設想：隨着社会主义关系的發展，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組織機構也將逐漸變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人們廣泛实行自治的直接民主制度，就是說，變成人們在其中將不作為这个或那个政党的支持者活动、而作為对待各种具体社会問題獨立採取态度的自覺劳动者活动的制度。對於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說來更是如此，因为革命是这种制度的出發点，而如果回到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上去，那就意味着放棄革命，使社会倒退，把它投入反民主的怀抱。当然，在直接民主制的条件下，共同的觀念能把个人集結起來，但是这种集結不應具有一种受束縛的政党联合的性質。直接民主制的这种發展过程，同時將是作為階級意識工具的國家的消亡过程。这里我們可以看出資產階級間接民主機構（这种民主制在其一切正統形式之下都是对中央集权制國家政权的肯定）和建立在不斷擴大的社会自治基礎上的社会主义直接民主制（这种民主制，归根到底，只是作為一般階級工具的國家消亡的政治形式）之間的重要差別。我想，所有一切民主的發展道路都會導向國家的这种改变，不管它們的出發点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正統機構，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國家機構。

二、南斯拉夫發展社会主义和 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

我們也是从这个角度來觀察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及其民主政治機構的内部發展的。因此，我們坚决拋棄上述的設想，就是：南斯拉夫的内部發展必然會導向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形式的机械的復活。我們的民主实际上只是第一步，但却是走向这样的民主

形式的一步，这种民主形式將是正在建立起來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礎的有机反映。

不僅上面說過的主要因素說明事物必須这样發展，而且具体的政治原因也說明事物必須这样發展。在我們的条件下；就是說在管理公有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僅佔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小私有生產者則佔全部人口的60%以上的國家里，以及在我國社会主义建設所处的極端困难的國際条件下，如果机械地回到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形式上去，那就是决心放棄保衛革命及其成果，归根到底就是要放棄我國的獨立和在國內建成社会主义的事業。

誠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人批評我們的觀點。这些批評家們是这样提出問題的：我們不否認你們的已經推翻了一个反民主的反动制度的革命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但是在革命勝利以后，你們應該建立一个正統的欧洲民主制度。

这种反对意見是非常抽象的。它首先不顧这样一个事实：旧南斯拉夫沒有过民主並不是由於南斯拉夫資產階級根本不願意建立民主，而是因为它不能建立民主，就是說特別尖銳的内部矛盾不容許它建立民主。由此可見，南斯拉夫資產階級的反民主主义乃是我國一定的物質和政治关系的表現。

战前南斯拉夫的社会經濟和政治結構

战前的南斯拉夫是欧洲最落后的國家之一。全國人口中，僅約10%從事於工業、鑛業和建築業，而75%左右的人口居住在農村中，以相当落后的方式耕种土地。

虽然按水力資源來說，南斯拉夫拥有660億左右瓩时，僅次於挪威而居欧洲第二位，但在1938年按人口計算的發電量却僅為

70瓩时。而当时在欧洲，每一个人平均分得350瓩时，更不用说西欧的发达国家（每人平均量为350—830瓩时）或挪威（每人平均量，我想，是3,300瓩时）了。

我国钢产量每人平均为15公斤，而在西方国家则为120—340公斤。

电力工业的产量比欧洲平均产量小58倍。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比奥地利小10倍，比意大利小11倍半，较比利时小18倍，比法国小32倍，比瑞典小49倍。

南斯拉夫在焦炭、石油、汽车、变压器、拖拉机、机制纸等产品方面，则全靠输入以满足其需要。

此外，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國家，而且國內某些地区在經濟發展上有着很大的差別。这样的社会經濟和政治結構，使南斯拉夫不可能在旧階級的領導下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進展。相反地，它使南斯拉夫在經濟上越來越深地依賴外國，越來越相对地落后於发达的國家了。由於这些原因，國內的剝削就必然会日益加剧。这种情况的結果是：整个制度日益腐爛，各种矛盾日形尖锐（譯者註：其他譯文中还有：政治制度日益反动和反民主）。只有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進的革命运动才能使我國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以便有效地進行斗争，爭取把我國从落后的状态中解放出來。正因为这样，才發生了革命；也正因为这样，革命才取得了勝利。由此可見，社会主义的方針不僅是擺脫內部社会矛盾的出路，而且是使國家擺脫落后状态的唯一可能的道路。

这些物質和政治因素影响了（虽然是在另一种方式下）而且現在还影响着我們的社会在革命以后的發展。誠然，革命改变了政权的性質，而且解放了進步的社会物質和政治力量，但是它不

能自动地改变國內物質关系，因此也就沒有消滅由此產生的矛盾。因此，很明顯地，如果我們甚至於在原則上決定這樣做，我們一切想通過社會主義革命以建立即使資產階級也因社會內部矛盾所阻而不能建立起來的正統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企圖，也必將全歸失敗。這些企圖不可避免地會把國家投入內戰的漩渦中去，或者把國家交給復辟階級的反動暴政手中去，或者——這是更可能的——交給國家資本主義官僚制度手中去。

革命——向直接民主制前進的出發點

由此可見，革命只能成為向新的民主形式即向直接民主制——使任何政治壟斷消亡的形式前進的出發點，否則，革命就會喪失它的內容。當革命已經發生的時候，那時只有革命能成為發展的起點。要回到任何旧的、革命以前的形式上去，在政治上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那樣革命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革命了。革命應該是改變物質关系的開始，只有這些关系的改變過程才能決定適應於新的經濟基礎即適合於生產資料公有化的新的民主形式的發展規模和速度。由於這些原因，我們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鬥爭方針不能是把人們錯誤地稱為“一黨”制的革命制度變成有階級的多黨制度（譯者註：其他譯文是：……變成有階級的資產階級多黨制），而是要發展直接民主制，這種直接民主制將會隨着時間的進展，消滅對任何政治壟斷的任何需要，不管這種壟斷是採取“一黨”的形式還是採取“多黨”的隱蔽形式。

但是我們不談論抽象的理論，而且也不願意把社會所不能接受的形式強加於社會的頭上。因此，對我們說來，在我們的條件下，任何民主的社會主義政策的出發點就是：加強社會主義的

經濟基礎，從而加強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就是說，加強工人階級的人數、經濟力量和他们對生產力發展的直接影響；最後，加強工人階級在管理經濟和社会方面的立場。此外，還需要進行不斷的工作來發展社会主义的社会覺悟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傳統，沒有這一點，就不可能設想直接民主制各機構的工作會進行得好。當然，實踐將首先是提高這種覺悟的學校；但如果讓這一整個過程完全自發地發展那是錯誤的。關於這個問題我以後再談。

工業化是我們在加強社会主义經濟基礎方面的基本任務

基於這些想法，在革命以後，我們便首先負起了使國家工業化的艱巨任務。我們的工業化並不是像我們的西方批評家們所說的教條式的“成見”。相反地，甚至在我們完全不考慮我國所處的具體的國際政治局勢的情況下，我們也要首先從一個非常現實的角度出發來處理建設社会主义的問題。這就是說，社会主义力量，只有當它們能在社会中建立起日益自由的关系時，才能取得對反革命力量和官僚主义的勝利；但是，只有當社会主义力量在經濟上已經如此強大而足以使全國的經濟發展都能隨着它們前進時，這種情況才能實現，換句話說，只有當社会主义力量不是成為落后的城鄉小生產者的汪洋大海中的某種社会主义經濟基礎，而是成為一個將以其經濟影響而不是依靠國家力量來排除落后的社会关系的統治因素時，這種情況才能實現。可是，我們曾必須着手改變社会力量的物質关系以利於社会主义。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做，那末經濟上相對薄弱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威力主要在於國家機關的現象就會繼續存在下去，而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加強官僚主义傾向。（註：這句話的俄文譯文不清，這裡是猜譯的。另外兩